

ZHANGSHENFU
FANGTANLU

张申府

◎ (美) 舒衡哲 著
◎ (美) 李绍明 译

访谈录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张申府文集

张申府著

张申府

访谈录

张申府著



张申府访谈录

(美) 舒衡哲 著

(美) 李绍明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申府访谈录/(美)舒衡哲著;李绍明译. -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3

ISBN 7-5013-1776-3

I. 张… II. ①舒… ②李… III. 张申府 - 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89 号

☐ 中文简体字版©2000 01 - 2000 - 0085

☐ 中文简体字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授权

Copyright© 1992 by Yale University

☐ 英文版书名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fu

书 名 张申府访谈录

ZHANGSHENFU FANGTAN LU

著 者 (美)舒衡哲著 李绍明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涿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书号 ISBN 7-5013-1776-3/K·329

定价 18.00 元

中译本序

吾兄申府，原名崧年，以字行，在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和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参加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因与一些人的意见不合而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课，在学术界有较高声誉。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之后仍积极参加救国民主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国内战争时期，因昧于战争形势，应《观察》杂志之邀，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严厉的批判，致以后多年不能发表文章。50年代，由周恩来总理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病逝，享年93岁。

申府在哲学上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西方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解析”与“唯物”是20世纪哲学的两大主潮，同时又赞扬孔子“仁”的学说，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因参加早期建党活动及民主救国运动，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情况有较多了解，因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许多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学者经常访问申府，藉以了解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历史事实。著名美国学者舒衡哲教授是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史的专

家，曾对申府进行多次访问，申府亦敞开胸怀，有问必答。舒衡哲教授将多次访问的记录汇集整理编为一本专著，题为“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副题“张申府谈话录”。舒衡哲教授是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史的专家，曾发表《中国启蒙运动》专著，受到学术界的赞誉。现在又撰成此书，对于张申府的思想行动以及有关的历史事迹做了详细的论述，内容充实，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李绍明先生将此书译成中文，将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值得赞赏的。李绍明先生邀我写一篇序文，于是略表此书的价值，谨向读者推荐。

1997年5月，张岱年于北京大学

中译序

造成新世界的文字

好的翻译家经常警觉两种语文中现成相同的字。汉姆雷特中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在德国思略高(SCHLEGEL)的美丽译笔下翻成SCHULWEISHEIT,其意即“在学校中所传授的智慧”。

RUDOLF ARNHEIM: 日光的寓言

翻译《张申府访谈录》不啻是用文字去构造一个新世界的尝试……尤其张申府本人,他是在翻译方面有杰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著作对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亦能提出高度的挑战。关于这些困难,我在撰写张申府的生平和思想时亦深有体会。现在,透过李绍明君的精挑细选的文字,中国的读者能够走进张申府先生——这位特立独行的知名知识分子的世界,和他沟通交流。所谓“天作之合”,可能人人意见不同,但当一个主题遇到它的真正译者时,无人否定这是一项美事;而当我读着这本张申府生平的中译本时,我衷心感到这种美。张申府先生对他本人的译事,视为是文化的沟通工作;他深入研读大量的西方哲学和政治著述,以滤出对现代中国有用的智慧结晶;而当他一壁阅读西方文字时,他无疑一壁脑里也闪耀着相对的中国文字。

张申府先生从外国思想撷取许多深奥和陌生的意念，把它诠释给中国读者；而李君则把我访问张申府所写成的著作精炼成关于中国文化的对谈。对中国思想能起启迪作用的西方观念和思想大师吸引了张申府先生；同时，张申府先生作为一位在中国革命史籍中被忽略了的早期知识分子也吸引了李先生。李先生对本书的翻译，有助于中国史学境界的开拓，一如张申府先生透过介绍罗素、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及维根斯坦的著作扩阔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视野一样。他们两位都是筑桥者，他们不光在中国文化词汇中添进新词，而且显示外国思想如何可以用中国词语加以表达，从而扩大中国的词汇范围。

对于张申府先生在文化方面的探讨予以最公开的赞誉的，莫如周恩来 1962 年 3 月在广州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周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对张申府学术工作的高度赞誉，无疑带有一种政治上的肯定成分，因为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然而张对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哲学思想的贡献，亦普遍受现代学者例如梁漱溟、钱钟书、钱穆、冯友兰、朱自清、周扬等许多人所认定，他们一致同意张申府的新思想得力于他准确表达文字的天分。在他致力于扩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前一段很长的时期里，张申府曾绞尽脑汁试图把罗素的思想用清晰的日常文字表达出来，以饕中国读者。仅在 1920 年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张申府翻译了罗素十篇文字，而每篇文字他都为某些复杂的概念例如 LOGICAL ATOMISM 找出合适的翻译名词。他对 LOGIC 和 ANALYSIS 的翻译多方推敲，决定译为《名理解析法》。然而，这一带有西方色彩的名词未能使他惬意，最后他翻为《名理原子论》，使读起来更像典雅的中文。

这一文字游戏(抑或文字烦恼?)也是本书翻译者李绍明君所面临的挑战。李君的难题,是要把一位西方汉学家的众多意念和特有语法予以融会贯通,然后以得体的和丰富多姿的中文加以表达。因此我们绝不奇怪,李君在完成本书的正文后着手翻译序言时,他让他驾御文字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英文本的序言用纪佛斯(ROBERT GRAVES)一首艰深的诗作楔子,李君参透了诗的意思,用了一联对称的四字短句予以表达:历史之路,有时而穷。这既有深意,也富有文字之美,我相信张申府先生也会惊叹这神来之笔。我也相信他会同意艾海姆(RUDOLF ARNHEIM)的说法,好的翻译者会警觉两种语文中现成相同的字。

李君的翻译,可称比我的英文原文还更接近张申府先生文字游戏的本来面目,但读者切勿以为译文的流畅是因为张申府的说话容易理解。完全不是这回事。张的话语用词高深莫测,即使他用貌似简单的言辞去说话或写作,也往往含有深藏的言下之意供听者或读者去品味。为了要在简单的话语中拨草寻蛇,李君需要认识张申府对古文的偏好和造诣。因此,对于这位五四时期独特的知识分子,最使人快慰的,莫如找到言简意赅的成语去概括他的生命和思想。在我和张申府先生的谈话中,他喜欢说自己“宁折不弯”,而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爱用三个字总结他一生的工作:实、活、中。我在英文原著中,尝试为西方读者解读这些片言只语的意义;而李君在译文中,把张申府语带相关的说话送回它本身的文化脉络,使每个字都带有多重意义。

对张申府先生来说,恐怕没有一个字比“实”字来得重要和带来更多的问题。把这字的含义翻译成英语中的TRUE、TRUTH、AUTHENTIC或REAL都不可避免失去张申府的一部分原意。对于这个有不同含义的字,我在原著所能做的,只

有追踪这位众说纷纭的知识分子漫长一生中对这字的不同用法，以寻找其各个意义。李君的翻译，反映出在 20 世纪的某些年代中国说真话的困难，从而深化了“实”的意义。如果张申府真能对现代中国的读者传达什么新的重要的讯息的话，那就是因为李君在译文中掌握到了张在文字上和政治上的挣扎，而终能成为“实”的忠诚传道者。虽然张申府终其一生未能在行为上成为忠实的楷模（他有多数妻子和爱人，又曾拥戴不同思想信条），但在他的哲学中，他却是“实”的热诚鼓吹者。

1921 年当张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志忙于在上海建立共产党时，他在德国哥廷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实话党》。他利用身处海外的优势（欧洲是在千里之外）给在上海行动中的同志写出讲实话的重要。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呼吁，这是张申府意图扭转他同胞的注意力，使从革命的表面工作转到深层方面；而讲老实话成为张申府终生不渝的追求。当时许多仁人志士希求改变社会制度；但张所坚持的是“自然革命”和“性格革命”。即使在受到羞辱、指控和囚禁的时候，张仍然矢志于开拓其思想领域及不停挑战其已有的看法，而在这过程中“实”是一条连他自己也不放过的标准竿。

“实”也是李绍明君的翻译的主要特色。但他的译文并不只是换另一种文字的照本宣科，而是对张申府先生内在精神以及我对现代知识分子困境的研究所进行的访问的如实反映。李君所追寻的不仅是中英语言的互换而已；他致力的是为中国读者重新塑造一个环境，这环境哺育了一位十分有创见的思想家（在这方面，张申府先生的女儿张燕妮女士也给了大力的帮助。张女士近年来编辑了许多张先生的著作）。张申府先生的文字，目的是缩小中西思想的距离，李君的翻译也抱有同样的目的。李君把一位被忽略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遭遇呈献给读者跟

前，这位知识分子的贡献使后来者能够创建一个更为周全——也更为真实——的中国文化观。就这方面来说，张先生和李先生的文字，不愧是造成新世界的文字。

舒衡哲

原序

历史之路，有时而穷

桀骜难驯的、有生命的、温驯可爱的，

你难道不认识他们吗？他们是谁呢？

让时间从屋角溜走

历史的路通不到屋内

叫出他们的名字，或数出他们的数目。

ROBERT GRAVES：噩梦

1979年，张申府先生，中共建党的幸存者之一，接受了我这个西方人的访问。在随后的五年中，我有幸成为张的对谈者。我们在他北京王府仓胡同的家中谈了总共70多个小时。我们两人喝着茶，用中文交谈，没有第三者，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录音机。我一面听着他的生命的故事，一面发展我们的友谊。

张的一生，像他的故事一样，对我这个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提出挑战。这里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一个介绍中国广受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他应该是一个为人熟悉的公众人物，然而他的生平故事却要我越过20世纪的著名革命事迹，到那被遗忘或被压抑的角落里寻找。

我们的谈话给我打开了一个我以前不知的世界。在现代中

国历史的大路上，有许多旁支，我进入这些支路，接触到了罗素、数理逻辑和爱情，这些东西与儒家、辩证唯物主义和毛泽东所占的空间不遑多让。正是在这些旁支中，张申府找到了他个人的世界观，并保持他的世界观的完整性。

这本书不是标准的历史著作，也不是传统式的传记，而是透过迂回曲折、前后比照的对谈反映张申府一生。本书没有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或意念，它是由许多小故事组成的网，一层层、一页页地把它的主人包围在中心，我让读者自行体味、判断以及重组故事的片段；在逐层剥开这个网时，每人或许对书的主人翁形成不同的看法。至于我，则在故事的过程中说明我的观点，以及在通往张申府的生命和住屋的路上，为读者竖起清楚的标志。

我和张申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9年11月12日。会面由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官员安排。我那时正研究1919年五四运动，张的名字引起我的兴趣。他是新潮社仍然在世的人之一，而新潮社是五四时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我们初次会面，主要谈的是公众大事。

1979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这运动受中共历史所歌颂。该年中美进行第一次学术交流，我是交流团的成员之一，得到中国官方允许研究五四运动。张申府是这个运动的过来人，刚刚得到摘帽平反，解除“右派”的称号。

我们在国家图书馆会客厅见面，谈话的主题是历史大事。不多久我就觉察到在这客套的场合里，其他的门正为我开着。虽然我们的谈话重点应该是历史，但张申府却有意无意引入其他话题，特别是他个人的故事。

这个坐在我对面沙发椅上的86岁老人，当他拿着拐杖在女儿搀扶下走上图书馆的梯级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虚弱的，但

是现在在会客厅里，他却是精力十足，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得令人惊奇。在我们的第一次会面里，他总是提起他个人的琐事、他的哲学兴趣和他的爱情生活。

这些个人的生活片段和中共正在纪念的五四运动并无关系，但对我来说，却是意外的收获；我希望知道得更多。于是在访问结束时，我大着胆问：“我希望能够再见到你，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府上拜访，再继续我们的谈话呢？”

1979年，外国人尚未能够随便探访中国人的家。张申府坐着坐在对面的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

接着的五年，张申府一次又一次在他的王府仓胡同的家中接待我。在那里，我了解到他这悠长生命的许多事实。这些事实有些是那么引人入胜、不可思议，我曾经想过给张申府写部长篇小说。但有些情节，包括他已长期淡忘的生活章节，又竟是这么真实，使我这个历史学家不能够视为儿戏。好像河里的尖石块一样，我每一次走进纯粹的想像时，它们就刺我一下。

我要另闯一条道路，一条既可以表达对话的顺畅，又可以不时被刺一下停下来思考的道路。我相信我和张申府谈话是进入张申府的生命的最有意义的方式。它是我接触他的文章主体的跳板。他的著作分散在不同的杂志里，读着这些文字我发觉它们对我们谈话中所涌现的“史实”有时是配合的，有时是扭曲的，有时却又是质疑的。这些著述终会成为过去所存在的一部分；它们是一条锚索，使回忆不致从复杂的真实经验中漂流得太远。

张申府回忆往事和我们友谊发展的节奏，决定了每一章的内容。由于这个节奏是回旋性的和情节性的，本书各章并不依循时间的顺序，而是围绕对话中某些情结和矛盾而层层展开。有

些问题张申府所给的答案并不圆满（通常都与历史事实无关），这使我细味张陷入的纠结。在本书中我探索过的张申府的纠结包括：风流成性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癖好数理逻辑的共产主义者、宗师罗素却又景仰孔子的哲学家、爱好学院式哲学的政治活动者。

本书没有解开这些结，它只指出这些结的存在及它们所引起的斗争。这些斗争并没有减少张申府对回忆的兴趣。谈话给他的欢乐使他暂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的愤怒。

本书在1979—1989年的酝酿期间，许多同事和朋友——不论是在西方的或是在中国的——都慷慨拨出他们的时间或赐赠他们极有深思的意见。张申府先生是我要致最大感谢的对象。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开始（1979年，那时中美关系刚试验性地解冻），他就很清楚让我知道他愿意跟我谈话。我在他北京王府仓胡同的家进行了60小时的谈话录音（这些录音的效果时好时坏，因为他许多时候说话呢喃，特别是他90岁以后。此外在开始时的好几个月，我的录音设备又不太好）。这些录音带现存放在我私人的张申府收藏中。

在北京，张申府的家人十分好意地协助我的研究，特别是他的两个女儿张燕妮和刘方清，以及他的胞弟哲学教授张岱年。此外，张申府的好几位朋友和相识接受我的访问，其中有些我要特别致谢，他们是：许德珩、梁漱溟、王瑶、吴晓铃、徐盈及李健生，没有他们对张申府的时代和生命的坦率的、广泛的和刺激思考的评论，本书很可能会只限于主人翁单方面的回忆和观点。在中国我也从汤一介、李泽厚和乐黛云几位的批评中得到很大的益处，他们帮助我明白张申府思想中的哲学和史学的矛盾。作为中共巴黎小组的始创人，张申府在法国过了很重要的几年。我在巴黎得到了卓维尔（CHERVIER）、杜鲁斯

(DULOIST) 及巴尔文 (BARMAN) 很慷慨的帮助，他们介绍我看到中国学生在巴黎活动的档案。

在美国老家，我要感谢：

利云妮 (MARILYN LEVINE)，她与我分享她研究早期欧洲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成果以及她和中国学者的接触；

艾力图 (GUY ALITTO)，给我提供梁漱溟的资料；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和魏大力 (FREDERIC WAKEMAN)，对原稿提出极为有用的意见；

赵美钿 (CHRISTINA GILLMARTIN)，我的朋友及这口述历史计划的中国游伴，她替我向北京的张申府家人传递讯息，并给我提供关于刘清扬的资料及研究所得（刘清扬曾是张申府的爱侣，也是 GILLMARTIN 研究中共女性党员的对象之一）；

高韩 (RAUL COHEN)，特别感谢他在本书初稿发展到一个关键点时详细审阅全稿；此外，他多年的无私友谊，以及他对本书的深入、细致的批评，对我研究现代中国文化史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茅桐、马少中和许行（以上三者均为译音），我的中国研究助手，他们辛劳了多月，把张申府的文章做出摘要和索引。

DR DORI LAUB, SARAH GLAZ 和 JAN WILLIS，助我用较为新鲜的方式处理张申府传记的材料；

CHARLES GRECH 和 KAREN GANGEL，耶鲁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人员，使本书内容更为紧凑及负责本书的美术设计；

DEBBIE SIERPINSKI，非常谨慎地多次打印我的一改再改的原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丈夫邬济生 (JASON WOLFE)，特别是

他对张申府的兴趣，以及在 1984 年 10 月陪伴我最后一次访问张申府。过去几年，对张申府的记忆差不多使张成为我家庭的一员，济生表现的耐性，使我感到欣慰。

我也对以下的组织：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局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哲学协会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和威斯里仁大学 (WESLEYAN UNIVERSITY) 所提供的研究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